

第一章 绪 论

教学流派的产生源远流长，恰如茫茫九派流中国。其实，流派何止九个？各个时代，各种流派，如花开春日，星灿碧空。每种流派都曾影响一时，及于后代。所以说流派是时代的产物，每种流派的形成都有其广阔的社会背景。就一般而言，教学流派是教育思潮、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风格的综合反映。那些思想倾向和教学风格相同或相近的执教者，自然就形成了同一教学流派。

一、我国古代的教学流派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曾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其实这不仅仅是学术派别之争，因各学派都收徒讲学，所以也体现了教学流派之争。这里仅以儒家和道家学派为例，便可略见一斑。

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教学思想和艺术风格可以概括为“心教、言教、身教、物教”。所谓“心教”，就是孔子不仅重视“思”即认知因素的作用，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而且非常重视理想、动机、兴趣、情感、意志即“志、好、乐、恒”等非认知因素的积极作用，在教育教学中注重确立理想，引发动机，激发兴趣，调动情感，锻炼意志。所谓“言教”，就是

重视各种语言艺术如讲授、问答、讨论方法及类比、暗示、分析、综合、描述等技巧在教学中的灵活运用，使语言教学做到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由现象到本质、由事实到规律。所谓“身教”，就是以身作则，充分发挥教师的示范榜样作用。孔子经常用自己崇高的道德风范和伟大的人格力量去感化和影响学生。他曾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他曾用天打比方对学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在教学中，“身教”往往能起到“言教”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所谓“物教”，就是“比物丑类”。孔子经常在教学中“能近取譬”，就是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学生所熟悉的事例来启发教育学生，比如他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复一簣，进，吾进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又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他用山川松柏来教育学生要做到持之以恒，坚持意志磨炼，珍惜时光。孔子的教学思想和教学艺术对后世有深刻影响。

孟子作为孔子教育学说的继承者，则把教学艺术概括为“善言善道”：“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孟子·尽心下》）所谓“言近而指远”即孔子的“能近取譬”，也就是教师的讲授要切近学生的生活经验，但寓意却深远，重视引用身边的事例来教育启发学生。他引用的事例很多，下棋、射箭、工匠、流水、禾苗等等，信手拈来，贴切恰当，生动形象，析理透彻。所谓“守约而施博”，就是要求教师的讲解应做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之，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可以言就言，不可以言就不言，“引而不发”，也就是要求教师做到精讲，以收到影响广泛的教学效果。他认为，要做到这些，必须依据一定的教育教学原则，掌握多种教学艺术技巧即“教术”。他说：“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孟子·告子上》）并明确指出“教亦多术”：“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达问者，有私淑艾者。”（《孟子·公孙丑上》）在教学中，孟子极力倡导启发诱导、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力戒灌输注入、揠苗助长，其教学艺术同孔子可以媲美，集中体现了儒家学派的教学风格。

道家学派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其教学思想别出心裁。老子从天道自然无为的哲学观出发，提出了“自然无为”的自然主义教育教学思想。所谓“自然无为”，就是教育要顺应个体身心发展的内在顺序和规律，反对教育者凭主观意愿强作妄为，否则教育必然失败。老子要求教育者“希言自然”，即不要过多地训诲教导，应按照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去从事教育教学活动，努力达到“无为无不为”的教学境界。

“无为”并非不要教者无所作为，而是反对违反个体身心发展规律的强作妄为之意；“无不为”即无所不为，没有什么事不能做成之意。“无为无不为”，即在教学中教育者“无为而任自然”，受教育者有为而处于中心地位，充分发挥出主体能动作用。老子明确提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老子认为，通过“不言”、“希言”，达到“有言”、“善言”；通过“无为”，达到“无不为”；真正收到“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的教学效果（《老子·四十三章》）教育者只有做到“无为不言”，受教育者才能自主、自悟、自化，充分发挥

出内在固有的潜能，达到“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的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至高境界（《老子·四十七章》），老子的这种教学思想在后世得到继承和发扬。

庄子的教学艺术观主要反映在《庖丁解牛》中。他说：“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也。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他认为，教学艺术就是技艺达到一种“神遇神行”的高度完美、炉火纯青的状态或境界。他还主张“化声相待”、“传其常情”、“精诚动人”，即重视榜样的示范作用，情感的感染功能。

战国时齐国兴办的“稷下之学”是当时各派学者荟萃的中心。所谓“稷”，指齐国国都临淄的稷门。齐国在稷门下所设的学校称“稷下之学”。当时的儒家、阴阳家、道家等各派学者云集于此，形成自由争辩的空气，并纷纷著书立说。孟子曾游学于此，荀子曾在此三为祭酒（领袖），主持稷下学宫，受到“士”人景仰。先秦的学术成就在稷下达到了最高峰，这是我国古代乃至世界古代教育史上所罕见的。

我国宋代随着书院的勃兴与发展，大兴讲学之风。各学派自立门户，并存而争驰。最有代表性的是朱陆两大流派的学术争鸣。南宋时期著名教育家朱熹和陆九渊的治学思想是尖锐对立的，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教学流派。有一次，朱陆在江西鹅湖寺组织了一次“学术辩论会”。会上，朱熹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教育学生明白道理，必须多读书。”陆九渊则连连摇头道：“道理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中，书读多了反而糊涂。”朱熹忍不住站起来，大声争辩：“不破万卷书，怎能成其才？”陆九渊拍案反击：“书堆积如山，何年何月读完？”书案左右，两人唇枪舌剑，各执一理，争得面红耳赤，十几天未见分晓。这就是教育

史上有名的朱陆“鹅湖之会”。

朱熹和陆九渊在治学思想上虽有不同，但他俩并没有因此形成门户之见，谢绝往来，而是相互尊重，互拜为师，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后来，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邀请陆九渊去讲学。陆九渊闻讯后欣然前往，做了题为“义利之辩”的讲演，生动深刻地剖析了科举制度的弊端，使身受其害的莘莘学子听了痛哭流涕，朱熹也连声称赞讲得好，并把他的话刻在石碑上，立于书院门口，与诸生共勉。这件事被世人传为千古佳话。

二、我国近现代的教学流派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百余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动荡最剧烈、变化最迅速的时期。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教育思潮迭起，教学流派纷立，形成了各派独树一帜又糅合复叠的争鸣局面。

洋务教育思潮勃兴于 19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不是偶然的，因为在这一时期，清朝遭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西学开始东渐，洋务运动兴起，为这一流派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张之洞。他提出“中学治身心 西学应世事”的教学思想（《劝学篇·外篇》）；“中学”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学习“中学”的目的在于“纯正心术”，即用儒家心性伦理学说来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学习“西学”，即学习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是为了掌握富国强兵的技能和本领。张之洞还强调“旧学为体 新学为用 不可偏废”（《劝学篇·外篇·设学》），只有中西兼学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方面发展

需要的实用人才。在当时救亡图存的情况下，西学成为教学的当务之急。他认为：“凡天文、舆论、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份内之事。”（《张文襄公全集·公牒》卷 30）并要求培养具备西学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他在各地办了许多以教学西学为主的各类新式学堂，培养外语、军事、工矿、农业、交通、教育等方面的人才，将其教学思想付诸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维新教育思潮以“康梁学派”为代表。康有为认为变法维新的迫切需要是人才，而培养人才则是变法的第一要事，因而“兴学养才”就成为维新变法的主要内容和教育理念。他从“兴学养才”的教育目的出发，提出了“开民智”的教学思想。他说：“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康南海自编年谱》第 146 页）所以，他在《公车上书》中提出了“今日之教，宜先开民智”的主张。他创办了万木草堂，以“激厉气节 发扬精神 广求智慧”；“兼通中西学说”为宗旨，在万木草堂学规《长兴学记》中，仿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范例，全面安排教学科目，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诸方面发展的变法人才。

梁启超不仅继承发展了康有为“兴学养才”和“开民智”的教学思想，而且特别重视改革教学方法。他极力反对“导之不以道，抚之不以术”，即不顾儿童心理、泯灭学生个性的旧式教学法，大力提倡并积极推行兴趣教学法。1924 年他在直隶教育联合会作《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的演讲，提出：“对教育来说，趣味就是一切，一切就是趣味。趣味是目的也是手段。”他把趣味贯穿于教学的各个方面。首先，课程安排要遵循儿童的年龄特征和心理发展特点。为此他设置了音乐、体

育、图画、游戏等课程。这些课程与知识课程交叉安排，使学生在自然、和乐、愉悦的氛围中受到教育。其次，教学过程做到课内外结合，课内学业不可安排太多，因为学童“脑实未充，斡肉未强，操业之时，益当减少”。课外要安排适合学生心理特点和兴趣特长的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自余暇时，或游苑囿以观生物，或习体操以强筋骨，或演音乐以调神魂”（《饮冰室文集》第二册《论幼学》），再次教学方法要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他主张运用形象生动的直观教学、调动学生主动性的问答教学、循序渐进的讲解教学、强调学生参与的游戏教学、通俗易懂的歌谣教学、使学生产生快乐而不致厌倦痛苦的愉快教学等方法，注重教学的科学性、思想性、通俗性和艺术性。梁启超是我国近代最早论述趣味教学、重视教学艺术研究的教育家。

20世纪初我国兴起的科学教育思潮，反映了特定社会环境中人们需求科学知识、期盼科学发展的思想倾向，也反映出中西文化在教育领域碰撞后引起的变异。当时热心提倡科学教育的有识之士首推严复。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要真正做到为中国社会带来“幸福”，只有“著意科学”，从而“破旧学之拘挛”，使受教育者获得“疗病起弱之实力”（《严复集》第3册）。可见他把科学教育提高到了救亡图存的重要地位。

严复认为，国民的才智是国家富强的根源。要使国民的才智得到高度发展，就必须反对封建主义的训诂、注疏、经义和八股，学习西洋的科学和技术，特别要研究牛顿、瓦特、培根……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他不但重视以科学知识为学校的教学内容，而且还提倡以西方求实的科学方法指导教学。他特别指出，没有科学的方法，就难以求得真实的学问。中国的传统教

育之所以不可能收到“开民智”的效果，落后的教学方法亦负有相当的责任。

科学教育教学流派的发展，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树起“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而科学教育思潮正是借助这股强劲的东风，不断高涨，形成汹涌之势。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说，民主与科学“若舟车之两轮”，必须“并重”。就科学而言，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不懂得科学，就会“无知妄作”。不论士、农、工、商、医，都将受害不浅。因此“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见《敬告青年》）。当时一些留学欧美的留学生纷纷回国，如陶行知、胡适等人，他们目睹欧美科学对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故此对科学教育的倡导最为致力。在他们看来，“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科学的世界。整个中国必须受科学的洗礼，方能适于生存”（《陶行知全集》第3卷）。他们认为“科学者，解决问题之利器也，现在科学未臻万能，然其发达，固日进不已也，久而久之，终有万能之一日”（《科学》第16卷）。他们进而确认，在现时中国社会，科学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传授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精神。

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辞书》上说：“创造教育为最近教育思潮之一种。”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高扬创造教育旗帜的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他不仅写诗撰文发表了精辟的创造教育思想，而且进行了创造性教学实验，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实施创造教育教学的先驱者。

陶行知在《创造宣言》中指出：“只要有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神所爱住的行宫，就能开创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陶行知全集》第3卷）这是

针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创造而言的。就教育者的创造来说，他在 1919 年就提出：“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他们“敢探未发明的新理”（《陶行知全集》第 1 卷 114 页）。他希望教育实践与研究要有创造性。他认为教育者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非有创造教育的理论和技术不可。事实上，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及其在育才学校的教学实践中，就体现了当时的创造教育理论和艺术。

在《创造宣言》中，陶行知批评了“环境太平凡，不能创造”，“儿童年纪小，不能创造”等消极思想，得出“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的结论。在《创造的儿童教育》一文中则进一步论证了“儿童有创造力”的观点，他大声疾呼要解放儿童的创造力，并在他创办的育才学校里“培养幼年研究生”，进行创造性教学实验，取得了显著成效，造就了一批专业人才。

在近现代教育史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大成为学派林立、自由争鸣的文化圣地。蔡元培广延名师，主张用人皆“以学诣为主”，凡有真才实学者，不论其学派、年龄、资格和国籍如何，均视若“校宝”而聘用。他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所选聘的教师，就政治而言，有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有无政府主义者李煜瀛，有戊戌变法的改良主义者梁启超，有帝宪制保守派刘师培；就哲学思想而言，有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学说的陈独秀，有鼓吹实用主义的胡适，有崇拜封建礼教而梳着长辫子的辜鸿铭；就史学而言，有朴学大师章太炎，有厚古派陈汉章，有薄古派钱玄同；就文学而言，有提倡白话文的鲁迅，有

坚持文言文的黄侃，有擅讲昆曲的吴梅；就年龄而言，有 20 多岁的梁漱溟，有白发苍苍的崔适；就资历而言，有清代科举的进士，有现代学位的博士；就国籍而言，德、英、法、美等国大学的许多知名教授均接到过北大的讲学聘书。当时，各派人物，各种思潮，活跃在北大讲坛；各种刊物也众说纷纭，百家争鸣。学术研究、自由讨论之风盛极一时，气象为之一新。

蔡元培实行兼容并蓄，博取众家，但也不是不偏不倚，而是站在新派一边，使新派在文化阵地争得地盘，以战胜封建旧文化，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这在客观上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1918 年，李大钊到北大当教授，讲授《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这是我国大学里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的最早记录。当时北大的许多学生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不是偶然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五四”运动的前提，而蔡元培为此开辟了道路。

三、我国当代的教学流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结束了旧时教育思潮与流派纷争的局面。新的教育思想的确立，教学流派的发展，坚持和时代的发展同步，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 1949 年到 1978 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以总结、推广教育实践经验为主流，教学改革实验则呈局部发展状态，而且通过教改实验在理论上自成体系、形成流派的犹如凤毛麟角，且以单科教学流派为主，未曾在广阔领域出现百鸟鸣春、万花映树的繁荣景象。

20 世纪 50 年代，全国推广军队教员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实验，对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60

年代，江苏启东和杭州开展“三算结合”教改实验，经过长期的探索，使“三算结合”的理论和方法日趋完善，而今还产生了“珠算式心算”，影响全国，波及国外，可以说这是我国独创的小学数学教学流派。与此同时，四川井研县组织教师开展小学语文识字教学的研究，历经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我国首创了“字族文”识字法（将生字集成若干字族，再依据字族编成文情并茂的字族文课文，通过学习字族文来掌握这一族字），并总结出识字教学的科学体系——理论体系、教材体系、教法体系、实验体系。一些语文专家认为，“字族文”识字法的创建，“是我国语文识字教学改革历史性的突破”，“是汉语识字教学中的一场革命”。可以说这是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教学流派。

1964年，上海育才中学总结出了“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的十六字教学经验。到70年代后期，他们针对当时流行的“加班加点，题海战术”和课堂教学模式僵化的问题，提出了变教师的“授”为主为学生的“学”为主，倡导“读读、议议、讲讲、练练”的八字教学方式，其中读是基础，议是关键，练是应用，讲贯穿始终。“八字教学法”变“授”为“学”，在教学中既有重点的精讲，巡视指导，又注意鼓励学生主动地自学，教会学生思考，变“一言堂”为“群言堂”改变了教师唱“独角戏”“满堂灌”的教学局面，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科学的读书方法和良好的读书习惯，有利于开阔学生思路，提高他们观察、发现和探索问题的能力，有利于联系学生实际进行因材施教，有利于师生双方相互切磋、相互补充、相互启发，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卢仲衡同志从 1965 年开始主持中学数学自学辅导教改实验。所谓自学辅导教学，就是学生在教师的启发和辅导下进行自学，获得知识、发展能力、形成自学习惯的一种教学方式。这项实验以初中学生为实验对象，从初中一年级开始，采取自然实验法，设实验班与对比班。对比班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实验班则采用在教师辅导下以学生为主体的自学方法，运用“启、读、练、知、结”的模式（即启发、阅读、练习、当时知道结果并及时反馈、小结）。实验经过循环往复，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教材（包括自编的课本、练习本和答案本）和教法。自学辅导教学的整个实验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教会学生阅读方法（即“粗、细、精”地阅读课文）；第二阶段，主要是让学生适应自学辅导这种学习方式，逐渐形成自学习惯；第三阶段，在初步形成自学习惯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独立性；第四阶段，形成良好的自学习惯，充分发挥学生的独立性。这项实验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上述“三算结合”与“字族文”识字法属于学科教学流派，是不可能应用到小学其它学科而发展成为普通教学流派的。“八字教学法”先从语文学科进行实验，逐步扩展到中学其它学科；“自学辅导”先从数学学科进行实验，逐步应用到中学其它学科，可以说两者是从学科教学流派发展到普通教学流派的典型。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一阶段是教学流派勃兴与发展的春天，是前一段所不可比拟的。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锐意创新，在广泛而深

入地进行教改实验的基础上，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升华为新的理论体系，逐渐形成了一些富有影响的教学流派。诸如本书重点述评的目标教学流派、情境教学流派、尝试教学流派、成功教育教学流派、愉快教学流派、创造性教学流派等等，真是各显神通，各呈风采，使得千百年来的教坛莺声燕语，春意盎然，形成了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的局面，成为当今教育教学改革中一道绚丽的风景线。

纵观当代各种教学流派的发展态势，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一是群众性。群众中蕴藏着丰富的智慧和极大的创造性。目标教学流派的形成，正是建立在蓬蓬勃勃的群众性教改实验的基础之上，实验学校、实验教师遍布全国，形成燎原之势，所以目标教学体系充分显示着群体智慧的光彩与创造的特色。二是独创性。中国的教学改革必须走中国自己的路。新时期教坛上涌现出一大批被誉为“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专家”的特级教师，围绕着这些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特级教师，自然形成了一些教学流派。如李吉林的情境教学，邱学华的尝试教学等，都是扎根中国土壤，独具民族气派的教学流派。三是继承性。“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没有“源头活水”，怎能继往开来？愉快教学流派的创立者，从现代儿童教育家“活的教育”理论宝库中找出“爱、美、兴趣、创造”四个要点，进行实验，加以发展，确立为愉快教育四要素。四是开放性。毛泽东倡导的“古今中外法”，早已深入人心。研究外国教学流派，博采众家之长，扬弃各说之短，立足本国，努力创新，是完全正确的。比如和谐教学流派的形成，就是在研究外国暗示教学、“纲要信号”理论的基础上，吸收其科学因素，融入自

己的思路而成为一体，从而创立了和谐教学流派。

“教育是一种很难传授的艺术”，在“传授”“教育艺术”中，应当允许不同风格的教学流派自由发展，相互促进，使教育园地呈现百花齐放、竞奇斗艳的景象。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教育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需要。

愿教育舞台流派纷呈，群星灿烂！

第二章 目标教学流派

1986年9月，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应华东师范大学邀请来我国讲学。一石激起千层浪。以“目标教学”为旗帜的群众性教学改革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由起初部分省市和地区开展教改实验，不久便席卷全国，形成燎原之势。其实验面之广，参与人数之多，成效之显著，在我国当代教育史上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

目标教学实验与研究是在借鉴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策略”和教学目标分类理论上起步的，一开始带有强烈的自发性自由研讨的色彩。1995年全国目标教学专业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标志着我国的目标教学开始由分散、自发走向统一、协调。后来，“目标教学实验与研究”被列为国家“九五”教育科研重点课题。在十余年的探索历程中，广大教育科研人员和教师以辛勤的汗水，智慧的光彩，创新的勇气赋予这项改革实验以鲜明的中国特色。

长期以来，对于什么是目标教学，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00年8月，全国目标教学专业委员会经过充分研讨，一致认为：目标教学是以目标导向和反馈矫正为基本特征的教学体系。这一界定简明扼要，既反映了目标教学的特征，也揭示了目标教学与其它教学流派的本质区别。

第一节 目标教学的主要特色

华东师范大学冯起德教授撰文认为：目标教学是当代教学改革三大流派（理性派、感性派、人本派）中理性派的杰出代表。还有的学者称目标教学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影响的四大教学实验家族（学导式教学、目标教学、情境教学、创造教学）之一。目标教学的主要特色体现在：

一、以教学目标为中心组织教学活动

教学目标是“教师通过教学活动对学生身心发展变化的期望”。这种期望是靠教与学双方按照一定程序“交流——互动”达成的。因此，教学目标在教学的全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制约着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它既是教学的出发点，又是教学的归宿。教师必须围绕教学目标组织教学活动，即依据教学目标进行教学设计；依据教学目标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依据教学目标组织学生的学习活动；依据教学目标调控教学过程；依据教学目标评价教学效果。目标教学研究认为，只有从明确、具体、科学化的教学目标出发，到预定教学目标的达成而结束的教学，才是真正的优质高效的目标教学。教学目标对师生的教与学具有导向、激励、调控功能。

目标教学研究对布鲁姆的教学目标分类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建立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教学目标分类体系：（一）将认知领域的六级分类转化为中学的“记忆、理解、运用、综合”四级分类和小学的“记忆、理解、运用”三级分类。对情感和动作技能领域的目标分类理论也进行了类似的转

化。(二)为了体现教学目标分类理论的中国化,实验者进行了大胆尝试。例如,辽宁阜新市教研中心结合我国实际,把认知领域与动作技能合二为一,称为“智能序列”;把情感领域一分为二,称为“思想品德序列”和“学习修养序列”。(三)编制了中小学各学科教学目标分类参照系,具体揭示了每类教学目标在学科教学中的特殊要求,它是中小学教学目标分类体系的具体化,为教师制定教学目标提供了依据。教师要依据教学目标来规范教学行为,并判断目标的达成度,以此来调控教学过程。因而目标教学提出了目标定向原则,整个教学活动都要围绕教学目标的达成来进行,这是目标教学最重要、最基本的特点。

二、以单元作为控制教学过程的基本单位

重视以知识单元为基本结构进行整体教学设计,是当代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将教材按照其内在的知识结构分为若干相对完整、独立的单元,在整体设计和分节授课的基础上,把单元知识系统化、结构化,以单元达标作为控制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策略,在实现单元目标后,再进行下一单元的教学。从教学过程的角度看,单元教学是介于学期与课时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教学单位。布鲁姆认为,以知识单元为单位组织教学,便于系统地有计划地反馈调节。实践证明,利用单元形成性测试来调节教学过程,有利于面向全体学生,落实因材施教的原则,避免缺陷积累,进而解决后进生的转化问题。从知识结构的角度看,每个知识单元都具有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可以对学生进行知识、技能、智能与个性发展的综合训练,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从教